

读史阅世

平和首任知县罗干身世

□本报记者 萧镇平 文/图

平和县的置县与王守仁有关。明正德年间,王守仁奉旨平定漳南叛乱后,为确保当地长治久安,向朝廷上书奏请设置“平和县”获得批准,因此被平和人称为“县父”。首任平和知县系江西永丰人罗干。值得一提的是,罗干系明朝状元名儒罗伦的次子。

守仁奏设平和县

平和县与闽粤两省八县(市)毗邻,素有“八县通衢”之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建置漳州郡后,平和属漳浦县。元至治年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之部分地建置南胜县,辖今平和、南靖全境及云霄部分地,隶于漳州路。县治设于今平和县南胜镇(后迁于今平和小溪镇旧县村)。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县治迁于今南靖县靖城,更名南靖县。

明正德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民乱席卷了闽、粤、赣交界地区。据当地史志记载,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赣闽湘粤四省交界的山区先后掀起多股规模较大、影响甚远的山民暴乱,危及朝廷政权。为此,兵部尚书王琼慧眼识才举荐,王守仁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平剿暴动。至此,王守仁第一次踏上漳州的大地。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别号阳明,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其死后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此次巡抚南、赣、汀、漳等地,王守仁研究多年的“知行合一”学说终于有机会得到检验与实践。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一月底至四月初,王守仁亲率2000名精兵入闽平漳乱,打响他建立功业的第一仗——漳南战役,攻破了盘踞在漳州南部、闽粤交界山区数十年之久的40多座山寨,肃清了以福建詹师富、广东温火烧为首的民叛乱。

平和县委王阳明研究员学者张山梁说,暴乱平息后,王守仁认真分析了当地民众落草为寇的原因,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五月,拟制《添设地新县治疏》,首次提出在其平漳南叛乱之地新设县治的动机和设想,建议割南靖县清宁、新安等里,漳浦县二三等都,添设一县。上疏不久便得到朝廷批准。

“照得县名须因土俗,本职奉亲历诸属,询知南靖县河头等乡俱属平河社,以此以名平和县。”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王守仁二度上疏《再议平和县治疏》,奏请朝廷设立福建省平和县,平和县名由此而来。自此,在漳南大地上多了一个平和县,王守仁因此被平和人称为“县父”。

状元名儒罗伦

平和县成立了,接下来朝廷要考虑的就是让谁来当这个首任知县。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任命罗干为平和首任知县。清道光版《平和县志》记载:“罗干,字定本,江西永丰人。”县志同时记载其为“一峰先生仲子”。

那么,一峰先生又是谁人也?其实,他就是明朝成化丙戌科(1466年)状元罗伦。罗伦(1431—1478年),明代理学家、状元。字应魁,号一峰。吉安永丰人,南宋忠臣、抗元民族英雄罗开礼九世孙。



在平和县城的阳明公园中,王阳明雕像两侧分别镌刻《添设清平县治疏》和《再议平和县治疏》。

罗伦,家贫好学,樵牧读书,诵读不辍。14岁即授徒于乡,以资养亲。成化二年(1466年)会试,对策万言,指切时弊,擢进士第一即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名震京都。

罗伦为人刚正,义之所在,毅然必赴,视富贵名利如浮云。后曾被谪为福建市舶司(泉州)副提举,成化四年(1468年)四月改任南京翰林院修撰等。成化十四年(1478年)卒,年仅48岁。嘉靖初年追赠左春坊谕德,溢文毅。著有《五经疏义》《一峰集》《周易说旨》,后世被整理收入《四库全书》,是有明一代的状元名儒。

说起罗伦,许多漳州人并不陌生,因为传说罗伦之所以能高中状元与漳州有关。南靖县金山镇有一座名胜,因两峰如鹤髻而得名“鹤髻山”,又因山林中有许多天然石洞而称为“鹤髻洞”。此山奇峰突起,石壁嶙峋,秀丽非常,是南靖县八景之首。山腰有座道观,匾额曰“九鲤飞真”,系仙游九鲤仙分镇之处,传说圆梦甚灵。

相传明朝成化年间,江西学子罗伦晋京赴考,绕道来到鹤髻山山腰的“九鲤飞真”宫祈梦,可是住了9个晚上,空无一梦,十分懊恼,临行在墙上题诗一首以明心志:“千里寻仙意甚虔,九霄无梦亦无眠。神仙不识人间事,罗伦此去不回来。”

罗伦拂袖而去,行至半途,发觉自己的包袱、雨伞忘记取了,于是匆匆返回,不料看到刚刚题的诗已被篡改了。诗被改成:“千里求仙意未虔,九霄无梦岂无眠,神仙识人间事,罗伦此去中状元。”

罗伦中状元之后,上书忤旨,被贬到福建泉州当市舶司副提举。于是,他便来到鹤髻山还愿,铺设了从“飞瀑亭”到“九鲤飞真”宫的石阶小道。这条石阶小道被后人称为“罗伦古道”,至今还保留着,是鹤髻山景区重要打卡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罗伦到南靖鹤髻洞祈梦时,尚无平和县,当时的南靖县辖区就包括平和县全境。罗伦自己估计也想不到,数十年后,从南靖县分出平和县,而他的儿子罗干成了平和县的首任知县。

罗干壮志未酬

罗干出生在一个状元家庭,家风好,其父教子有方。据清康熙版《永丰县志》记载,明弘治八年(1495年),罗伦的小儿子罗桂中举;两年后,即弘治十年(1497年),罗干中举;弘治十七年(1504年),罗伦侄儿罗玉也中举。虽然此时的罗伦已去世多年,但是在永丰县,一门“一进士三举人”已传为佳话。

作为“一峰先生之子”的罗干中举后的仕途,史志中记载并不多。记者辗转查到清光绪版《江阴县志》相关记载:正德七年(1512年),罗干任江阴县教谕,已是中举15年后的事迹了。江阴县教谕这一职,罗干干了5年。正德十二年(1517年),罗干调任福建闽东,任宁德县知县,任上有作为,官声很好。

明嘉靖版《宁德县志》记载罗干:“状元一峰子,由举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任,性刚毅,遇事敢为,莅政以教化为先,朔望谒庙,劝讲徐往社学教伤生徒,久而不怠,守正奉公,令行禁止,人无敢干以私,在官三年,秋毫无取,时称其有父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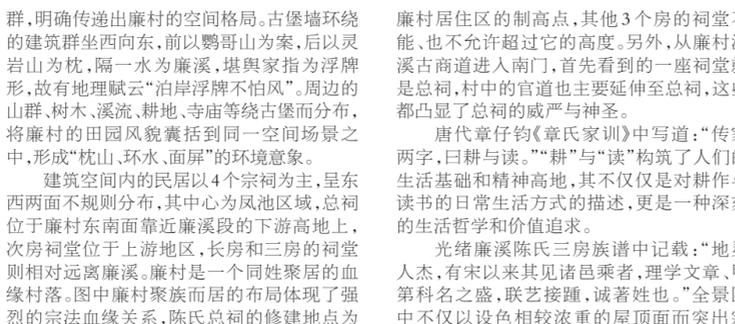
就在罗干还在闽东宁德知县任上时,王守仁正在紧锣密鼓筹划奏请设置“平和县”事宜,而且还向朝廷提出首任平和知县的选拔建议。他在《再议平和县治疏》中提出:“再照新县所属,多系新民,须得廉能官员,庶几开新创始,事不烦而民不扰。”意思是说,平和是一个新成立的县,来这个县任职的官员,必须能做到既廉洁又有能力,不麻烦老百姓更不能骚扰当地群众。

看来,罗干符合了王守仁所说的“既廉洁又有能力”的标准,于是,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任命罗干为首任平和县知县。罗干从闽东宁德来到闽南平和县任职。当时的平和县正值王守仁平叛不久,而且又是新成立的县,可谓百废俱兴,罗干本来也胸有成竹,想大干一场,无奈突然身患重病,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当地百姓都很伤心。

清道光版《平和县志》如斯记载:“时建县之始,百度未访,干悉经理,胸中具有成画,盖将加意于斯民者。未逾月,死于瘴,民咸哀之。”

唐代推行科举考试之后,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罗干地处水陆交通的枢纽,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中唐时代的薛令之在此环境中耳濡目染,并在自身的刻苦努力下,成为“开闽第一进士”,开福安甚至福建科举仕进之先河。

宋代,尤为南宋,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杭州,闽浙紧邻,位于“闽头浙尾”的廉村更容易受到中原文化、政治的辐射和影响。如朱松、王十朋、朱熹、郑樵、陈淳等一批学者相继来此讲学,基于这样的学术环境,廉村人才迭起,名人辈出。从宋大观三年(1109年)至宋宝祐元年(1253年)的前后150年中,连续出现17位进士,其中最为荣耀显赫的是陈雄一门五进士,父子兄弟俱登高第。



清光绪版《廉村全景图》

群,明确传递出廉村的空间格局。古堡墙环绕的建筑群坐西向东,前以鸚鵡山为案,后以灵岩山为枕,隔一水为廉溪,堪舆家指为浮萍形,故有地理赋云“泊岸浮萍不怕风”。周边的山群、树木、溪流、耕地、寺庙等绕古堡而分布,将廉村的田园风貌囊括到同一空间场景之中,形成“枕山、环水、面屏”的环境意象。

建筑空间内的民居以4个宗祠为主,呈东西两面不规则分布,其中心为凤池区域,总祠位于廉村东南面靠近廉溪段的下游高地上,次房祠堂位于上游地区,长房和三房的祠堂则相对远离廉溪。廉村是一个同姓聚居的血缘村落。图中廉村聚族而居的布局体现了强烈的宗法血缘关系,陈氏总祠的修建地点为



南靖鹤髻洞景区



罗伦古道

史海钩沉

中国首个电报学堂——福州电报学堂

□丘新洋 陆秋燕

自1844年问世以来,电报在西方国家的广泛推广与运用也引起旅美闽籍华人的重视。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从美国归来的闽县人林鍼撰写出介绍旅美奇闻轶事的《西海纪游草》,书中对电报运行原理、机械构造及传输方法多有提及,是推介电报知识的早期华人。

为迅速掌握中国商品市场信息和政府对外政策,西方人希望在中国架设电报所需的电线。但清政府对电线架设持保守和反对态度,不但担忧“外国洋人有私设铜线”的做法,而且担心地方官员遇到“各国洋人有私行设立铜线并请开铁路等事,即设法阻止”。然而,西方国家为追求电报带来的现实利益,常常私下架设电线。清同治三年(1864年)福州海关关税司理人登借“福州港门屡有偷漏,亟应设法严行禁止”为由,要求架设从福州南台河至罗星塔的电线,“以冀得信迅速,便于查办”,但因沿线村民的激烈反对而作罢。同治十三年(1874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泛船浦教堂附近设立电报营业所,准备私自架设福州至厦门的陆路电线。面对西方在华架设电线的强势要求,清政府决定改变过去对电报持有的消极态度,主动将福州陆路电线铺设权收归官办。

促成清政府对电报技术态度转变的关键因素是,洋务运动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希望引进西方先进器物实现自强。同时,如沈葆楨等地方重臣也意识到电报之于军事的重要性。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流难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意图侵犯台湾。清政府派沈葆楨率海军赴台防御,沈氏到台后深感电报技术的重要性。他在奏折中称,“欲消息畅通,断不可无电线”。

1875年7月,经过多番磋商后达成协议:清政府向大北电报公司支付154500美元,大北电报公司则为清政府经营和管理电报线路,并教授中国学生电报技术。但电线开始铺设后常常受到地方民众的阻挠和破坏,进度受阻,每日薪资却依旧要支付百余元给大北电报公司职工。为此,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购买电线器具、培养本土人才的方案,获得批准后,福州电报学堂建设与福州电报学堂开办步入正轨。

1876年4月8日,福州电报学堂正式开办,它是中国第一所培养电报人才的学堂。办学地点设在福州南台岛泛船浦(旧称“番船浦”)。由于福州电报学堂隶属于福州马尾船政局,故不少学者误以为电报学堂地点应在马尾船政局附近。据清政府与大北电报公司签订的条款所载,电报学堂开设期间,大北电报公司可以在中国已经购买的电报总局楼上居住,“毋庸另租洋楼,其下即作学堂,所有学童住处,与及局内司事看更人等,由官自理”。可以知之,电报学堂设在南台岛的电报总局内。

1875年,大北电报公司与清政府达成另外协议,清政府允许丹麦在“南台新造电报馆一所,于兴化、泉州小馆二所”并“该司当为中国管电报书信,并以电报法教育中国学生”,大臣文煜给军机处的一封信中称,“南台番船浦两线归并一处,设立大电报局一所,约数月乃可竣工”。何璟在奏折里也提及学堂的办学地点,“延请洋教习三人,内总管一人,帮教习二人,于南台电报馆内教习艺童”。

除档案史料外,几则关于电报学堂的新闻报刊史料亦足以辅证办学地点。《万国公报》载,“兹大丹国电报北公司与国家立约,以电线如何制造,如何用法教授中人,俾后来能自行创立,现招选艺童四十名在南台每日成行中业,已开馆教授并赁旧华记花园为艺童居所”。可见电报学堂招募了40名电线艺童,在南台进行学习与实践,还租借花园作为艺童的学习与生活场所。另据《北华捷报》的记载,“学生们由一名军官负责管理,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堂纪律,住在政府购买的毗邻电报局的房子里”。

综上所述可知,福州电报学堂办学地点应在南台岛的泛船浦,而非马尾船政局附近,两地相距约20公里。福州电报学堂招生时,限定人数为40人,经过考试筛选后有32名学生符合要求。其中,28名会说英语,来自香港中央书院;4名会说法语,来自阿森纳学校(Arsenal School)。学堂教员有3名来自大北电报公司,并由公司主管恒宁生(Jakob Henningsen)负责整个教学课程。

关于学堂的教学内容,学校分为两个班级,一个班级负责培养电报工程师,另一个班级用于培训电报办事员和仪器制造员。学生要接受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和开展电报实践工作,目的是教会他们自主建设、运营和管理陆路电线。按计划每六个月将进行考试,根据学生成绩予以晋升和奖励。为保证教学效果,清政府与大北电报公司签订协议时强调“教习既受中国薪水,务须竭力尽心教习”。西方教员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教授电气、电信原理和操作方法,而且还教学生如何制造电线、电报等各种机器,甚至到电报总局实践,亲自动手操演,于实践中加深对电报技术的理解与掌握。

清光绪二年(1876年),由于清政府与大北电报公司协议到期,“所有洋教习三员,自宜照约撤回,以节糜费”以及办学经费不足之缘故,福州电报学堂被迫停办。虽然福州电报学堂运营时间很短,但是却开风气之先,开启培养电报人才的历史先河,并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早期的电报人才。有的学生毕业后送往英国、丹麦电报制造厂等地继续深造,有的学生从事电报打工作,有的派遣到台湾参与当地的电报事业。

1877年,丁日昌在台湾主持铺设电线,考虑到台湾岛内南北路途遥远,信息传递困难,丁氏将福州留存的陆路电线移至台湾,由苏汝灼、陈平国等福州电报学堂培养的学生负责。在铺设电线过程中,他们尽量不雇佣外国人,遇到技术难题便通过翻译西方电报资料来解决。苏汝灼等人在台湾架设的电线是中国人自主建立的首条电报线路,运行良好,受到闽台外国人的赞誉。

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对台湾的管理,设立台湾省,由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刘氏考虑到台湾“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旬,不通音信”,便奏请清廷,要求铺设台湾海底电线,连接海峡两岸。其中北线自沪尾至川石,采用“飞捷号”装载所需的人员和物资,福州电报学堂毕业生也参与其中,受到刘铭传的赞誉。

此外,福州电报学堂学生也参与福建电报的建设,修建质量与水平均不逊于西方。《申报》报道称,“起先皆称此事必须电线公司建置,今则知尽由华人承办也。”“稍明电学者视之”“实与欧洲人所制相”。虽然收归官办后的福建电报事业发展步履蹒跚,福州电报学堂开办一年后也被迫中止停办,但其却开了培养电报人才之先河,培养了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批优秀的电报人才。福州电报学堂在人才培养、办学方式、教育理念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有益尝试与探索,为此后中国各地的电报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宝贵经验。福州电报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散落在各地,为福建、台湾等地的电报线路铺设、电报教育事业等作出巨大贡献。(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

乡土琐记

清代族谱中的《廉村全景图》

□缪远 何其海

清光绪版《廉村全景图》存于族谱《太邱陈氏三房全谱》中,以纸本水墨画的形式记录了福建省廉村在清光绪年间的山水格局,以小见大,传递了中国传统社会聚族而居、耕读传家的精神追求和现实愿景。

廉村位于福州市溪潭镇穆阳溪中游西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典型的“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山间小盆地。北枕灵岩山,西倚南山,村后有湖山与狮岩山,山后还有层峦叠嶂的山脉,廉溪蜿蜒形成“腰带水”。

陈氏三房支谱对廉村一带有如下描述:“溪为吾乡名区,山出双峰,自灵岩蜿蜒而来直抵廉溪,桑田北列,万派南奔,而廉溪独出其中以当山川之胜……凭眺山川,见夫双龙之秀,鸚鵡之奇,廉岭孤松,富溪舳口,风云变幻,气象万千,题八咏以怡情,赋棹歌而抒啸……西望狮岩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祥云六祖之刹,农夫樵之舍皆可指数。至若灵谷草堂,积善湖山薛村阙之所肄业,米襄阳之所留题,其留风余韵皆足壮观之色。”

《福安县志》亦载:“邑西南三十里廉村,旧名石矶津。海舟鱼货并集,远通建宁诸县,近通县城及各村,明设巡栏,复改设官牙,以平贸易。”

图文互证,史料的记载使我们对于图像的认知更加具体,而图像再现的山水田园格局,使我们不仅可以窥视到清代廉村的山水风貌,更可见其便捷的交通、发达的农业和繁荣的理想之所。

关于陈氏族谱中的清光绪版《廉村全景图》,以一幅主从关系极为明确的全景式构图,呈现出防御性极强的椭圆形古堡堡建筑

群,明确传递出廉村的空间格局。古堡墙环绕的建筑群坐西向东,前以鸚鵡山为案,后以灵岩山为枕,隔一水为廉溪,堪舆家指为浮萍形,故有地理赋云“泊岸浮萍不怕风”。周边的山群、树木、溪流、耕地、寺庙等绕古堡而分布,将廉村的田园风貌囊括到同一空间场景之中,形成“枕山、环水、面屏”的环境意象。

建筑空间内的民居以4个宗祠为主,呈东西两面不规则分布,其中心为凤池区域,总祠位于廉村东南面靠近廉溪段的下游高地上,次房祠堂位于上游地区,长房和三房的祠堂则相对远离廉溪。廉村是一个同姓聚居的血缘村落。图中廉村聚族而居的布局体现了强烈的宗法血缘关系,陈氏总祠的修建地点为